

谋

商

則皆教誨之疏
我曰此章言已誨
東翰以上而來
言束縛者多
出竟少幾
不

鞭之士。吾
我亦如不可
為之如不可
執鞭之士。吾
子言曰。德
猶德以得之
如不可求。則
人夾道。公則
辟行人。若今
狼氏下士。故
所不能慎。
疏。子之所慎。
戰。疾。戰。疾。

日本企业之父经典名著

商务圣经

与算盘

論語而可求也。雖執
日語而可求也。雖執
論語而可求也。雖執
日語而可求也。雖執
論語而可求也。雖執
日語而可求也。雖執

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
孔子言已行藏與
之則藏。唯我與
隨時行藏。不
軍則誰與者
發此問曰。若
意其與已
搏虎為
追

九州图书出版社

秘

〔日〕涩泽荣一 著

日本企业之父经典名著
《论语》与算盘

商务圣经

〔日〕涩泽荣一 著
宋文 永庆 译

九州图书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9 号

《论语》与算盘
商务圣经

作者:涩泽荣一

翻译:宋文永 庆

出版发行:九州图书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19 号,100032,电话:2234190)

经 销:新华书店

电脑照排:北京市银河文化信息咨询公司数据处理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西苑操场海淀体育场东 3 号)

印 刷:三河市残联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90 千字

印 张:8.25

版 次: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6 月北京第二次

印 数:15 000—20 000

定 价:8.50 元

《〈论语〉与算盘》中译序

蒋 庆

涩泽荣一，生于1840年，卒于是1931年，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享年91岁，作为企业界的领袖经历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4个时代，参与了日本走向现代的整个历程，对日本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赴欧考察学习西方的产业制度，率先改革日本的租税和货币体制，推行新式的会计制度（复式簿记制度），最早引进西方的股份制度（株式会社），创立了日本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日本第一国立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并参与创立或主持了日本500多家大企业，如王子制纸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阪纺织会社、东京海上保险公司、东京石川岛造船会社、大日本人造肥料会社、日本铁道会社等，这些企业已时逾百年，在今天的日本乃至世界仍具有巨大影响。最可称道

者,是涩泽荣一提出了“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儒家式经营理论,为日本的经济的发展确立了“义利合一”的指导原则,并且涩泽荣一以其儒商的典范影响了好几代日本企业家,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转化与复兴作出了活生主的有力见证。由于涩泽荣一在日本企业界与文化界的这一领袖地位与巨大贡献,他被赞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人”。涩泽荣一在其晚年,总结一生学习《论语》与经营企业的经验体会,将平日的讲演与言论汇集为《〈论语〉与算盘》一书,集中表达了儒家的经营理念与儒商的处世之道。总括其要,不外以下4个方面。

一、工商兴邦是富民益民的立国之本

在传统日本,同传统中国一样,都把工商看作四民之末而加以鄙视(日本将工商贱称为“町人”),并认为《论语》讲的是修身治国的神圣道德训戒,与街头巷尾求田问舍的“货殖富贵”决不相容。但是,涩泽荣一反传统的观点,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富贵,而只是反对不仁不义之富贵,若仁而义之富贵,孔子不但不反对,反而大加推崇。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引了孔子的许多话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涩泽荣一指出,《论语·里仁篇》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述而篇》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都是证明孔子不反对富贵,只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富贵。通过这种对《论语》的新诠释,涩泽荣一破除了将富贵抽离道德而鄙视的传统观念,发掘出了《论语》中以仁义之道谋取富贵的真精神,在工商人士心中树立了追求利润的合理动机,为

工商文明在日本的兴起作好了心理准备。

此外，涩泽荣一生活的时代正是日本迈向现代的时代，涩泽荣一敏锐地观察到，要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非走工商兴邦的道路不可。虽然政治法律的改革亦甚必要，但振兴工商实业则是富民强国的当务之急。涩泽荣一在解释《论语》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句话时指出，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称为圣，而要做到“圣”，就必须用财富去施民济众；欲布周文王之政，需要的也是财富。涩泽荣一把财富看作完善个人生命与完善政治的先决条件，亦是在为追求利润进行合理性的解释，为工商文明的兴起奠定神圣的基础。

涩泽荣一把工商兴邦看作是富民益民的立国之本，完全符合《论语》庶、富、教思想和儒家贵民的精神。儒学是世间法，世间法的第一要义就是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求，而这一物质需求只有通过工商实业的振兴发展才能获至。无奈这一思想在儒学的发展史上被逐渐遗忘，直至涩泽荣一重新解释《论语》时才发现，单此重释《论语》之功已至巨；此外，涩泽荣一为合理追求财富作了神圣的解释，为日本以及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奠定了精神的基础，其功又何可胜量哉！

二、“士魂商才”是儒者内圣外王的生命追求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这一理想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现代诠释或者说现代发展。所谓“士魂”，是指儒家义理熏陶出来的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所谓“商才”，是指实现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所必须的商业才干。也就是说，士魂是儒者内在生

命成德成圣上达天德的存在境界,即内圣;商才是儒者外在事功成人成物济世益民的凭借手段,即外王。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最完满的人格理想,在古代表现为立己立人尽伦尽制修己以安百姓的政治道德实践,成就的是以仁道治世天下归往的圣王人格,和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士君子人格。而在近代,涩泽荣一适应工商文明的需要,对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使儒家内外双修圣王合一的生命追求具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即具有了工商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士魂商才理念熏陶出来的人既是有内圣外王生命追求的儒者,又是有实际工商才干的优秀企业家。这种人格就是所谓儒商:其为儒,必须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而具有士君子之魂;其为商,必须追求企业经营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贸之才。可见,士魂商才是儒商人格理想的最佳表达,涩泽荣一不仅提出了这一理念,并且身体力行,成为儒商的最高典范。用儒家的话来说,可谓立人极矣!涩泽荣一之所以能够提出士魂商才的理念并身体力行,这同他幼年的教育和出身有密切关系,这里有必要作一简单叙述。

涩泽荣一出身在日本武州血洗岛的一个农民家庭,从7岁起就受业于儒家学者尾高忠淳,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书和史记、十八史略等汉学典籍,深受儒家义理的熏陶,并具备了坚实的汉学基础。在其青年时代,受其儒学老师的影响,十分仰慕武士的生活,曾作为一名武士参加了“尊王攘夷”的运动,后又做过德川庆喜的家臣。明治维新成功后,出任大藏大臣,掌理国家财政。后因与当政者政见不合,并认为日本强盛的当务之急在振兴工商实业,遂辞官而去,投身工商金融界,决心作一名商人。在涩泽荣一决定辞官做一名商人之前,心中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用现代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涩泽荣一经历了一次“存在选择的煎熬”。涩泽荣一非常清楚,商界亦如同政界一样,是一个利益争斗

的场所,投身其中会被污染,甚至会被毁灭。但是,工商又为富民富国之所需,作为一个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我不入其中谁入其中!然欲入其中,若无道德的承担力,非但不能富民富国,连自己的人格亦终将不保,怎么办呢?涩泽荣一经过一番艰苦的思索,认定只能从《论语》中来寻找答案,即涩泽荣一认为只有用《论语》中儒家的道德理想来作为自己心灵的支柱,培养起自己的道德承担力,自己进入商界后才不会被污染毁灭,从而才能实现自己富民富国的理想。打定主意后,涩泽荣一遂“下定决心以《论语》的教导为标准,一生从事商业活动”。涩泽荣一在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仍非常感人:

“我明治六年辞官,进入本来就向往的实业界之后,我和《论语》就有了特别的关系。这就是我刚成为商人时,心中有所不安。即想到今后要在锱铢必较中度过一生,应该有怎样的操守呢?此时我想起以前学过的《论语》,《论语》里所说的是修己交人的日用之教,我可按照《论语》的教谕经商谋利。”

涩泽荣一用《论语》的教导来指导自己经商谋利的活动,培养出来的就是“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风范。所谓“士魂”的涵养,全在《论语》的熏习教诲。涩泽荣一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划时代的儒商理念,完全得益于其幼时的儒学熏陶与青年时的武士经历。其深研四书五经自不用说,而武士源于侠,侠,按太史公的说法出自儒,故武士即是儒士,涩泽荣一出身武士,其为商人后仍以儒家道德精神为其生命之归依涵养,乃顺理成章也。

反观中国,不禁使人悲从中来!涩泽荣一力倡“士魂商才”,儒家的道德精神在日本孕育出了现代文明,而在中国则受到不肖子孙的辱骂摧残。至“文化大革命”,宣称要与传统作最彻底的决裂,在批林批孔中对儒家文化的破坏已登峰造极。在国人近百年来对儒家传统不断加码的摧残破坏中,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已

降到了最低点……即无“士魂”，亦无“商才”；既无安身立命成德成圣之教，亦无修己治世成人成物之具。中国士人的生命存在得不到源自天道性理的博大道德精神的支撑涵养，人格遂日趋卑琐浮荡，中无所守而甘被权力金钱役使作恶，富国富民之梦亦终未做成。时至今日，国人开始觉悟，始信若无“商才”富民强国不啻空话，于是遂讲求科技管理等工商致富之具；至于“士魂”，则懵然不知：不知自家生命之成德成圣是“商才”的基础，不知内圣外王双修是儒商的最高典范，不知远大的道德理想是担当人欲横流之商海的精神力量，不知只有“商才”而无“士魂”，决不能最终开出具有深厚精神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故当今中国工商企业界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找回失却了的“士魂”包括用传统优秀道德精神来支撑涵养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经商谋利的利欲活动安立一个合理的伦理动机，确立一个神圣的指导原则。要做到这一点，涇泽荣一就是效法的最高典型，《〈论语〉与算盘》就是涵养“士魂”的最佳教科书。若吾工商企业界中人能通过《〈论语〉与算盘》的阅读更进一步上升到直接研习《论语》，则“士魂”有望，“商才”不难矣。若吾工商企业界中人真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成就“士魂商才”的儒商理想，则实现中国式之现代工业文明又岂远乎哉！

三、义利合一一是工商活动的基本原则

《〈论语〉与算盘》一书的基本精神是“义利合一”。所谓“义利合一”，按涇泽荣一的话来说，是“《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打算盘是利，《论语》是道德”，二者相互依存而不分离。也就是说，“不断依据《论语》（义）中得出算盘（利）之理，又从算盘

中悟出《论语》有真正的致富之道”。在涩泽荣一看来,“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按照涩泽荣一的思想,“义利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公益为利,则利即是义,义利不分,如涩泽荣一在解释《论语·里仁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指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应该出于“义”的考虑去做,即使目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辞;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而不应该出于私利去考虑。涩泽荣一在谈及自己的经营活动时指出,其成功的投资都是出于公益(义)的考虑而非私利的考虑获至的。“义利合一”的另一层含义是承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的价值,不应该否定,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其符合伦理的目的,如涩泽荣一在解释《论语·里仁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时指出,富与贵是万人之所欲,故有其正当性,但必须以正当的手段来获取之,才符合道德的目的。这里所谓正当手段,就是用《论语》中的道德训戒来规范指导的手段。又涩泽荣一在解释《里仁篇》“放于利而行,多怨”时指出,如果只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一种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孔子在《春秋》经中曾大加赞扬。)宋襄之仁不适用于工商业领域,因为工商业必须以追求自己的利润为前提,但工商业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否则就会遭来世间的怨恨,企业也不可能长久获利。因此,为避免工商业损害社会的利益而遭怨,就必须用道德来规范其谋利的行为,在确信其行为合乎道德的情况下才放手去追求利润。

涩泽荣一“义利合一”的思想既承认谋利的正当性,又强调用《论语》来规范谋利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用道德来证成工商文明的合理性,为日本的现代化确立神圣的价值基础。其证成东亚

工业文明之功直可与加尔文证成西方资本主义相比！只不过《论语》是伦常日用之教，证成现代化比基督新教更直接、更少周折罢了。又，涩泽荣一以“义利合一”为主线来对《论语》重新进行解释，亦完全符合儒家的精神。儒家孔、孟、荀均承认利的正当性，同时又主张用义来规范利；即使是董仲舒言“正其义不谋其利”，亦只是对君子个人修身而言，而不是反对为他人社会谋利。至宋儒“天理人欲之辨”，天理即是公利，人欲即是私利，宋儒只反对私利决不反对公利，宋儒所推崇的《大学》言“散财民聚”，认为为一己之私利聚财是“货悖而入”；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宋儒对此三致意，可证宋儒亦主张“义利合一”。总之，如果我们从《〈论语〉与算盘》一书所开的解释新角度去重新考察两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我们就会发现“义利合一”是儒家一脉相承的根本精神。

涩泽荣一提出“义利合一”的谋利原则有其时代背景。在涩泽荣一生活的时代，日本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出现了混乱状态。表现在工商领域，则是商业道德败坏，商人放利而行，假冒伪劣商品盛行，社会普遍怨恨，人们对经商者均报以不齿的态度。针对这种情况涩泽荣一认为，一个没有道德素质的民族是建立不起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因此，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取决于日本民族道德水平的提高，而要提高日本民族的道德水平，就必须用儒家的道精神来熏陶日本人民。在工商领域，则必须用《论语》所揭示的“义利合一”的原则来指导工商谋利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商人的道德素质，为工商文明的兴起奠定人格的基础。

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今日之中国。正处在涩泽荣一曾经历过的转型期，工商领域亦出现了失范混乱现象，不道德现象比涩泽荣一时代的日本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表现在假冒伪劣商品上更是令人发指，人心已丧失了最基本的良知良能而堕入了

兽界鬼域！鉴于这种情况，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培养经商者的道德素质，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涩泽荣一揭橥的“义利合一”的原则则是儒家道德放之工商领域而行之有效的原则。愿吾工商实业中人奉“义利合一”的原则为圭臬，自觉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使卑下的谋利动机升华为崇高的践义行为，庶几人心可正，而民富国强亦将有望矣！

四、“《论语》+算盘”是东西合璧的成功尝试

《论语》源自中国，是传统东亚儒家文化圈共奉的经典，故《论语》代表着东方文明；而算盘，虽代表利，然要最大限度地谋利就必须讲求最有效的谋利之具，故算盘同时亦代表着谋利的最佳手段。如果只讲求谋利之道德性质（《论语》之道德训戒），而不讲求最有效的谋利之具（算盘之是否便利），则亦不能有效地实现富民富国的大义，即不能有效地实现谋利的道德目的。因此，涩泽荣一不仅重视谋利的道德性质，亦重视谋利之具的便利和效率。涩泽荣一虽立志以《论语》作为自己“终生处世的法则”，但涩泽荣一并不保守，而是积极地引进、吸收西方各种制度，使其为谋利的道德目的服务。涩泽荣一在考察欧洲的产业制度后得出一个结论：要富国富民，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的股份制度，因为涩泽荣一认为，股份制度可以把社会的闲散小资金聚集起来进行投资，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来为国计民生服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涩泽荣一创立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劝业银行。此外，涩泽荣一又引进西方的会计制度、财政制度，参照西制改革日本的税收制度和货币制度。涩泽荣一大胆地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改革日本的传

统制度，都是从算盘的便利性即谋利的有效性来考虑的。通过这种西制的引进和改造，涩泽荣一巧妙地把东西文明结合起来：《论语》的道德训戒代表东方文明，算盘的有效性代表西方文明，二者的结合可谓天衣无缝，圆融无碍。故我们说涩泽荣一“《论语》+算盘”的模式是东西合璧的成功尝试。

时至今日，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谋利之具在不断改进，故“《论语》+算盘”的模式可以发展为“《论语》+电脑”或“《论语》+××”的模式，但不管怎样变，《论语》均代表东方儒家永恒的道德理念，而所“+之××”则可代表任何西方先进的谋利之具。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正在处在建立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重大关头，中国式的企业制度是否能在我国建成，关键在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否建立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上。涩泽荣一“《论语》+算盘”的模式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是建立中国式企业制度的精神基础和价值源头。中国式的企业制度，如果用涩泽荣一的思想来表述，就是“《论语》+电脑”的企业制度。《论语》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在中国用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建立中国式的企业制度，比起涩泽荣一在日本用中国文化建立日本式的企业制度更名正言顺，更亲切自然。在日本，“《论语》+算盘”的模式只可称为东方模式；而在中国，“《论语》+算盘”的模式则可堂堂正正地称为中国模式。我们可以说，“《论语》+算盘”的模式正是近百年来热爱中国文化的先贤们所追求的中体西用的理念。遗憾的是，这一理念在中国没有开花结果而在他邦则以东体西用形式发芽生根。回顾这一沉痛的历史，仰瞻他邦的成功经验，我们也不能走全盘西化否定传统的老路了。我们现在从日本返哺“《论语》+算盘”的经营理念，只要我们不愿做中国文化的不肖子孙，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虔诚与智慧去培育这一理念，使这一理

念在其故土灵根再植，满国飘香。

《〈论语〉与算盘》一书共 10 章，每章都是涪泽荣一用《论语》指导其经营活动的心得体会，句句都浸透着一位八旬老人谆谆教诲的慈母心肠，故以上概述远远不能穷尽其全部内容，读者须从该书字里行间家常式的话语中细心体味其精神的博大精深。吾友李尚公先生悲当今商风之不正，士习之浇漓；感涪泽翁思想之纯正，人格之宏伟，转辗委托在日留学之友王平、闽京华夫妇觅回原版《〈论语〉与算盘》，并托人译迄。其对治时代痼疾之悲愿，嘉惠士林之苦心，吾知其欲使儒商复活于今日，在工商界中为孔学作见证也。又九州图书出版社决定率先在国内大陆出版是书，此时正值吾国建立中国的企业制度之际，此补益世运之功又可知而知矣。尚公及编辑张海涛先生索序于余，故为之序云。

孔元二千五百四十六年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八月

序于深圳布心花园

导 言

涩泽荣一并未放弃实业生涯，同时又投身于「商业圣经」《论语》的研究。

这是一本创造财富的书。

目的是要把没有罪恶相伴随的神圣的富裕作为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坚持一种保守生义的姿态。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阅读它，并从中学习到什么呢？

草柳大藏

草柳大藏

简介

1924 年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政治学专业。曾任杂志编辑、新闻记者。擅长于政论、人物评论、女性评论、艺术评论等。通过广播、电视上的演讲，最终确立了他在新闻界的地位。著作包括《满洲铁路调查部实录》、《具备实力的条件》、《山水艺术论》、《官僚王国论》、《斋藤隆夫的战争》、《日本各业大师录》、《特攻的思想》等。